

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 价值到强调核武器 的威慑价值

——对冷战初期美国核政策的一种研究*

● 朱明权

与其他军事力量一样，核武器也具有两种价值，即实战（defense）价值和威慑（deterrence）价值。与其他军事力量不同的是，威慑价值是核武器的主要作用所在：“核武器覆盖全球的作用距离和不可防御、不可恢复的毁坏作用相结合，就为威慑成为军事舞台的主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① 认识到

* 本论文属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所承担的教育部文科科研基地重大项目“中美核威慑关系”的中期研究成果，得到了教育部和复旦大学的资助。

① 张云义：《世界战争新形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核武器的主要价值是它的威慑作用，有助于推动关于核时代的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正像我们可以从世界上第一个核国家——美国所看到的，并非所有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核武器的主要价值在于威慑，也不是所有人始终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本文对战后初期美国核政策所作的考察表明，美国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价值转变到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几乎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并且，即使在此以后，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还是念念不忘地要发挥核武器的实战价值，要为美国能够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创造有利的环境。当前布什政府所作的种种努力，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危险倾向。

本文从分析武器的两种价值出发，进而探索了核时代开始以后美国在认识核武器的价值方面经历的曲折过程：最初杜鲁门政府是将核武器当作一种常规武器；50年代初以后，在核武器的价值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观念和政策逐渐陷入一种矛盾；肯尼迪政府最终确立了核武器的主要价值在于威慑的立场，并相应地调整了有关的政策。本文在结论部分简要分析了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指出任何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意图和努力都不符合核武器本身的特殊属性，违背了核时代和平与稳定的要求。

一、核前时代武器的实战和威慑价值

军事力量的实战价值和威慑价值是互不相同又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

军事力量的实战价值，是指它在实战中被直接用来消灭和摧毁敌人。无论是为了进攻还是防御的目的，无论是对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来说，军事力量的这种使用方式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人员（军人和平民）伤亡和（或）物质（武器和财产）损失。所谓“杀敌一千自损三百”就是这个意思。

威慑则不同。两位专门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亚历山大·乔治和理查德·斯莫克为威慑下了这样的定义：“就其最普遍的形式而言，威慑不过是使敌手信服：他可能采取的某种行动路线所涉及的代价和/或风险超过其利益。”^① 结合其他学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威慑下这样一个定义：“通过显示自己拥有的力量和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促使对手由于担心得不偿失或担心更加严重的后果而打消主动发起攻击的欲望。”^② 显然，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威慑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方式。如果威慑政策生效，就可在不必招致直接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情况下实现某种进攻或防御性的目标。

正因为如此，威慑的价值早在古代就已被接受，威慑的概念早在古代就已产生，虽然当时人们并未明确提出这一术语。例如，2000多年前，还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孙武就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其大意是，“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高明的战法；不必开战就能降服敌军，才是最高明的战法”；“善于作战的将军，不必开战就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395页。

^② 朱明权：《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能降服敌军”。^① 同样，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早已懂得用灾难超过可能达到的好处的恐吓使潜在的进攻者慑服”。^② 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运用军事力量的威慑价值的实例。确实，在中外古代军事史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交战方利用“大兵压境”或“兵临城下”迫使对手束手就擒或割地求和，从而取得了威慑政策的成功。

到了近代，威慑的概念和用途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像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说，“当各国通过派遣海军舰队、交换军事观察员，或缔结同盟条约等活动，向对方‘传递信号’或发出警告时，威胁也就寓意其中了。”^③ 最典型的例子当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威廉德国。1900年6月，它通过了第二个海军法案。根据这一法案，16年中，德国的海上力量上升到欧洲的第二位，虽然还赶不上英国，却足可对付英国的本土舰队，从而使得伦敦在任何德英对抗中必须谨慎行事。^④

但是，总的来看，在核前时代，威慑概念的发展和运用因为各种原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首先，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杀伤威力和作用距离都比较有限，而且具有可防御性，所造成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得到恢复。大刀、长矛只有在与

① 程郁、张和生（今译）：《孙子兵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16页。

② 张云义：《世界战争新形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③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395页。

④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8 - 1902, v. 2, New York, 1935, p.249.

对手面对面地作战时才能发挥作用，弓箭的射程也不过是百步而已，使用一次直接造成的伤亡只能以个位数计。热兵器的杀伤能力和作用距离自然比冷兵器有了很大的增长，但仍然比较有限。例如，各种火炮（坦克炮、榴弹炮、加农炮和火箭炮等）的射程也就在数百、数千和数万米之间，使用一次直接造成的伤亡也只能以十位数计。并且，冷兵器与热兵器都是可以加以防御的，它们的杀伤效果和作用距离可通过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防御措施——盾、各种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隐蔽等等——加以削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是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对盟国进行了狂轰滥炸，后是盟国对德国和日本进行了战略轰炸。尽管这种空袭造成了通常意义上的严重后果，但是这种后果依然由于各种防空措施而遭到削弱。此外，冷兵器和热兵器造成的破坏效果可在较短的时间中得到恢复。这里所说的恢复不是指被毁坏的财产可以修复，更不是指死去的人可以复生，而是指战场没有遭到根本的污染，在战斗结束以后活着的人们可以很快开始他们的正常活动，乃至着手重建家园。由于它们固有的缺陷或局限性，冷兵器和热兵器无疑难以对对手造成足够的威慑效果。

其次，冷兵器和热兵器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好的刀矛弓箭，如果落在没有真正武艺的人的手中，其效果也与棍棒石头相差无几。就是最为先进的枪炮的设计效果能否得到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使用者有关，取决于使用者的勇气和技巧。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训练，这些武器就很难击中目标；如果他们缺乏应有的忠诚，这些武器甚至可以被抛弃从而落入敌人的手中。冷兵器和热兵器在杀伤效果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对手的威慑作用。

再次，在冷兵器和热兵器时代，对手之间对相互能力和意图的了解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相互了解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落后。在主要依靠人的眼睛和耳朵收集信息的情况下，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发明电报技术以前，通讯主要通过骑马、坐车或者乘船的使者进行，需要数天、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对手间对相互的意图和能力缺乏了解，还由于有关各方对保密的高度重视。它们竭力不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能力，有时还故意制造假象或散布不实情报迷惑对方。如果说，这样做有可能加强武器的使用价值，但却往往削弱了它们的威慑价值。

最后，与上面三点原因相联系的是，在使用冷兵器和热兵器的年代中，武器的威慑作用并没有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认可，或者说，各国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威慑观”。从防御的方面来说，它们并不能确信自己的利益能够通过威慑政策的运用得到维护和保证，因此还是寄希望于武器的实际使用，即通过打败敌人来实现自己的安全。从进攻（侵略）的方面来说，它们并不相信对方手中的武器一定能够阻止自己的计划的实现，无论这种计划是为了得到对方的土地、人口或其他资源，还是为了取得某种有利的战略地位，抑或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这样，战争，或者说，武器在实战中的使用，就成了敌对双方的首要选择；武器的威慑价值，被置于次要地位。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核武器问世之前，威慑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主要和系统的政策。在核前时代，军事力量的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它的实战价值方面。

二、原子弹被当作一种常规武器

伯纳德·布罗迪 (Bernard Brodie) 说, 自从发展了核武器, 威慑“这一术语不仅得到特殊的强调, 而且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涵义”。^①但是, 实际上, 并非核武器一问世, 人们就立即并自觉地接受了它的威慑价值。当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后, 正像对前苏联遏制战略的设计者乔治·凯南所说的那样, 美国就面临着以什么态度对待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 以及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赋予这样的武器以什么作用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 我们是依赖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将它作为我们军事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期待在一旦陷入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中时就轻易地、直接地和毫不犹豫地使用它, 还是将这种武器保留在我们的国家武库中, 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威慑以阻止对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盟国使用同样的武器, 并作为在此种情况发生时的一种可能的报复手段。”^②不幸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初几年中, 核武器是被当作了一种超级炸弹, 本质上与常规武器并无两样, 只不过杀伤力特别巨大而已。

关于这一点,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 在 1945 年 8 月 6 日清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邵文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 第 395 页。

② George F. Kennan, *The Nuclear Delusion: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3 - 4.

晨于广岛投下一颗未经过核爆试验的“枪式”铀弹以前，美国并没有对日本发出过任何有关的警告，从而实现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它所看重的仍然是原子弹的实战价值。事后，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声明，生动地说明了他对原子弹的实战价值的信念：

有了原子弹，我们就得使用它。现在我们已经用原子弹惩罚那些在珍珠港对我们不宣而战的人，惩罚那些不让美国战俘吃饱、拷打并枪杀他们的人，惩罚那些干脆全然不遵守国际法规的人。^①

除了强调惩罚外，杜鲁门还提到有必要通过使用原子弹“缩短战争的苦痛”、“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人的生命免遭牺牲”。距离杜鲁门的这一声明发表不到两天，美国空军又在长崎丢下了一颗属于在新墨西哥的核试验场进行过核爆试验的那种“内爆式”钚弹。美国再次利用了原子弹的实战价值。

不仅如此，在此后一段时间中，按照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的说法，美国总是“相当炫耀地将原子弹这一武器挂在它的屁股上”。^②它的一些军政要员经常叫嚣要使用核武器，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尤其如此。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不久，美国政府就着手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11月4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尼采与国防部

①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② 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5, p.71.

负责原子能事务的助理洛伯准将就此事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结论是，立即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不会在军事上产生决定性作用，应根据时局的进一步发展再作决定；当前，国务院应负责研究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后果，军方则应根据“军事需要”作出相应筹划。四天以后，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处长埃默森提出了“关于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备忘录，认为在常规武器无法取胜或虽能取胜但美军伤亡过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但是，该备忘录也提出了在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方面存在的困难：第一，中国土地广袤、工业分散，投掷原子弹的“理想目标”很少；第二，此举会在世界舆论和美国人民心目中遭到谴责；第三，“一旦对中国使用了原子弹而仍然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对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对于西欧及其他期望得到我们保护的那些国家，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① 11月30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宣称，“我们将一如既往采取任何必要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当记者追问这是否表明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这位美国总统明确地回答说，“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女老幼，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可是一旦使用原子弹，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② 1951年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又设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所有主要补

^①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页。

^② 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给线上敷设一片放射性废料——原子制品的副产品”。^① 这里的关键并非是杜鲁门政府是否决定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而是它确实在认真考虑是否应当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说，杜鲁门政府当时主要想到的是核武器的实战价值，而不是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实现其威慑价值。

但是，应当看到，比较早地认识到核武器的特殊性质、认识到核武器的主要价值在于威慑的人还是有的。早在 1944 年 9 月，由参加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组成的杰弗里斯委员会就在一份报告中说：

美国自己建立核武器能起的最大作用是保证在纽约或芝加哥突然被彻底摧毁时，可以在第二天对侵略者的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同时希望侵略者慑于这种报复不敢动弹。^②

不过，该委员会并不认为这种威慑价值“有多大实现的可能”，“因为破坏性武器既然已经积存在这里，就迟早总要‘用上’”。凯南也相信核武器的价值在于威慑。1950 年时他说，核武器是“我们被迫拥有以防它们被我们的对手所使用的东西”；为此“我们应注意在军事计划中不要建立对它们的依赖”，“它们只代表资金和精力的巨大耗费，我们只要具有为威

^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第 282 页。

^②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7 页。

慑目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即可”。^①就连杜鲁门本人在其总统任期快结束时对核武器用途的看法也已发生了变化。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的艾尼威托克岛进行了爆炸当量为千万吨梯恩梯的热核实验。在此后不久发表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杜鲁门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原子时代，已经出现的技术变革使现在的战争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如果今天在苏联帝国和自由国家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这种战争不仅会给我们的斯大林主义对手掘下坟墓，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的社会、给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们的这个世界掘下坟墓。

……

科学语言是世界通用的，科学运动总是朝着未知领域发展。即使我们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我们也不敢假定苏联发展不出同样的武器，我们也不敢假定在原子能中尚未开发的其他领域没有蕴藏着更为可怕的毁灭手段……

科学实验的进步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料。原子科学正在飞速发展；揭示事物最深处秘密的活动正以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展开。从阿拉莫戈多核试验之后，我们已经开发出的原子武器的爆炸力超过了其早期规模的许多倍，而且生产的数量也非常之大。最近在艾尼威

^① George F. Kennan, *The Nuclear Delusion: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4.

托克岛进行的震撼世界的热核实验表明，我们已跨入了发展原子能的又一个新阶段。从今往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毁灭力空前的新纪元，这种力量所能造成的巨大爆炸威力足以使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相形见绌……

在能够达成国际协定之前，我们注定要走这条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取得的进步别人也同样可以取得。在这场竞争中，任何优势都只不过是暂时的……

在将来的战争中，人可以用一次打击便消灭成百万个生灵，毁灭世界上的大城市，扫除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并摧毁几百代人历尽苦难逐渐建立起来的目前的文明社会。

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打这种战争是不可行的政策。^①

显然，热核武器具有的巨大毁灭能力，以及前苏联将同样掌握这种毁灭能力的前景，使得这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下令使用核武器的美国总统感到，核武器不能被轻易使用于实战。就在上述咨文发表一周后，在一次主要是向全国人民告别的广播讲话中，杜鲁门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认识：“发动一场原子战争对有理智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23-324页。

的。”^①

三、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陷入了矛盾

到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明显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美国政府中一些人，有时包括总统本人，不仅在公开场合鼓吹以低核门槛为特征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而且也确实在内部场合考虑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195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原子武器在我们的武装力量中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常规地位。”^②1954年1月，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演说时声称，美国已决定“主要依靠庞大的报复力量”、“利用我们选择的手段和在我们选择的地方立即进行报复”。^③这一政策所包含的基本设想是，甚至在美国或其盟国刚刚遭到常规攻击时，美国就可能直接使用核武器作出反应，而不一定会经过常规防御的阶段。他还在另一场合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设法排除阻止使用这些武器的禁忌。”^④同年12月，他又在一个记者招待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9.

③ Jeffrey Porro (ed.), *The Nuclear Age Read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p. 243.

④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43页。

会上说，核武器只是在增加现代战争的毁灭性方面迈出的又一个步骤，大致上相当于与弓箭相比火药取得的进展一样。^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福德海军上将也认为，“如果我们确实建议使用这些武器，那么现在该是明确我们对使用这类武器的立场的时候了。”^②

当时的一些政府内部文件表明，这些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并不仅仅是恫吓。例如，1953年10月，艾森豪威尔批准的具有绝密性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就讲到，如果与苏联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一样使用核武器”。^③1954年12月，他在会见国会领袖时说，总的想法是“要在敌人开始行动以后又快又猛地打败他们”。1955年初，这位美国总统又说：“甚至在一场局部冲突中，美国也不能排除核武器的使用，只要这样的使用可以导致侵略得到迅速和明确的终止，只要根据政治和军事上的权衡这样的使用可以最好地促进美国的安全利益。”^④

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中又有一些人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核武器是不可使用的，对于使用核武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感到疑虑和担心。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9.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43页。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9.

④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50.

在不少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持有这样的立场。尽管他事先看到并且认可了杜勒斯在1954年1月作出的关于大规模报复的演说，但这位总统仍然对其中的赤裸裸的核威胁感到不满。2月间，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不认为夸夸其谈的大话能使其他人害怕。在欧洲，我们进行过许多战役。我不记得曾经有一次在战斗开始以前我们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我们巨大而又结实、有力而又坚强，我们准备把敌人的脑袋打得开花。’”7月间，在一次谈话中他提醒杜勒斯说：“当我们谈论……大规模报复时，我们的意思是对一种代表着无可挽回的战争的行为进行报复。”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压力，杜勒斯不得不在1954年4月的《外交》杂志上撰文说：“大规模的原子和热核报复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最有用地被祈求的力量”；需要的是“可使各种响应得以实现的灵活性和设施”；“自由世界必须具有在它选择的基础上作出有效响应的手段”；重要的是“应当事先让潜在的侵略者知道，它从侵略中遭受的损失会多于它通过侵略获得的东西。”^①这些话显然脱离了他原先的立场，提高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并且带有核威慑的味道。

1953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尽管明确提出了在与苏联和中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又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进一步的考虑以前，这一政策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0.

不得公开。”该文件还提到，战略核力量是“主要威慑力量”。^①一年以后，在1954年10月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任何事情都不会比美国现在宣布使用这些武器的决定更能使整个世界感到不安。”他还对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具体指示说，“如果发生全面战争”，应当依靠核武器的使用；但是，不应“在小规模战事中使用这些武器”。^②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陷入的这种矛盾，在朝鲜战争、印支战争、台海危机和欧洲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反映了出来。

朝鲜战争是一个最典型的实例。确实，在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成功以后，就有人向他提出了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例如，1952年底，前“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一份给当选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出，应当通知苏联，如果还不能就朝鲜停战达成协议，美国就准备通过“用原子弹轰炸北朝鲜境内的敌人军事集结点和军事设施，在战地散播适量的制造原子弹的副产品放射性物质”等措施，“肃清北朝鲜的敌方军队”。^③1953年初正式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的高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38、340页；Schuyler Foerester & Edward N. Wright (ed.),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6th edition,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4.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42-343页。

^③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

级成员几次开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在2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1次会议上，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杜勒斯等人都支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①在3月27日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举行的讨论中，海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和空军参谋长也都支持使用原子武器。^②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也有人对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持怀疑或反对态度。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包含了对核武器在朝鲜战场的效用以及对苏联的反应的疑虑。例如，在1953年3月27日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中，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坦率指出，“我个人颇为怀疑在朝鲜使用战术原子武器的价值。共产党人在150英里长的前沿战线上深挖防空洞。他们挖得很深。我们上一周的试验表明，如果达到了足够深度，人们可以非常接近爆炸地点而不致遭到伤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保罗·尼采说，必须考虑苏联对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是否会决定实施同样的报复”。^③在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5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自己也说，如果美国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他的一个巨大担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770.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817.

^③ Depar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817 - 818.

忧“便是苏联空军对几乎毫无防备的日本人口中心地区进行攻击的可能性”。^①其二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即对盟国的反应存在担心。保罗·尼采在同一会议上提请大家注意盟国的立场，“我们必须估计到因使用原子武器可能在我们与盟国的关系中产生的困难；如果这些武器事实上并不有效，此种困难还会增大。”^②在3月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自己也承认：“也许我们应该使用原子弹。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类行动对我们盟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的盟国感到，在一场美苏原子战争中，它们将成为战场。”^③

1953年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在朝鲜的可能行动方针的分析》（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7号文件）。它分析了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的利弊得失，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在此问题上感到的两难处境：“军事上，使用原子武器可以大大削弱中朝方面的战斗能力，比使用常规武器更有效地、更快地、更廉价地消除对我们在朝鲜的军事地位的威胁”，并“可能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原子能力在全球战争与有限战争中对苏联的威慑作用”；但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1065.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817.

^③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827.

是，使用原子武器也可能因“并未导致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削弱它本应具有威慑效果”，还可能在朝鲜战争中“开启使用原子武器的先例”（“联合国”军及其军事设施则是“这种武器的更为适宜的打击目标”），同时“减少美国原子武器库存及全球性的原子能力”。政治上，使用原子武器有可能使朝鲜战争获得有利于美国的最终解决；但是，盟国可能担心这“将使西方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大战”，“将使西方卷入对苏战争”。所以，该文件并未就此问题作出最后结论，而只是说，“这一类武器的使用与否，将留待今后决定。”^①实际上，直到1953年7月间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也没有作出一旦谈判破裂它就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它甚至始终未就此问题同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展开过认真的讨论，而这种讨论被视作美国可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一个必要前提。

在核武器使用方面的这样一种矛盾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1954年3月中旬，越南军民开始了攻打奠边府的战役，法国在整个印度支那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显然，它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很难在印支战场坚持下去。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巴黎要求美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援，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度试图直接介入印支战争。但是，由于来自国内外的阻力，同时也是因为美法之间的矛盾，这一计划未能实现。^②但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5, *Kore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845 - 846.

^② 这一过程参看朱明权、颜声毅：“试论战后初期的美国印支政策”，《复旦学报》，1989年，第6期，第80 - 82页。

是，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和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确实讨论过在印支战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当时国务院的官员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挽救奠边府。”由于为时如此之晚，雷福德和特文宁都认为“挽救奠边府只有一个办法”，即在奠边府采取核行动。后者在 11 年以后还颇为遗憾地回忆说：

我们不想轰炸中国大陆全部地区。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仍然认为这本应是个很好的主意——扔下三颗小的战术原子弹；奠边府——一个相当孤立的地区——周围没有大城市，只有共产党和他们的供给物资。……如果我们投下这些小原子武器，我们就可能没有今天在越南所面临的问题……我想三颗小原子弹只要投放位置合适，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麻烦或是开创一个先例。但是，它将很好地教训那帮中国人，我们可能挽救了法国，也许我们目前在东南亚的困难也可以避免。^①

1954 年 4 月 7 日，雷德福又派他的副官乔治·安德森上校就一个“微妙的问题”会见了国务院的官员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后者向杜勒斯汇报说：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366 页。

五角大楼的“前进研究小组”一直在评估能否使用原子武器以将越盟清除出奠边府地区。小组已经得出结论，三颗战术原子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足以摧毁越盟在那里的努力。

这一研究转过来又使雷福德上将心理上产生了一个问题：一旦在东南亚建立了美国参加的并投入兵力的联盟，我们是否可以对越盟使用原子武器，如果这似乎是摧毁越盟、清理印度支那的最好办法的话。

如果我们在东南亚组建联盟成功，雷福德上将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找法国人，征得他们的同意，在印度支那使用原子武器，如果在联盟参加作战时这仍是必不可少的话。他的感觉是，如果我们能够使法国接受使用这种武器的原则，使用原子武器的整个概念便得到了支持。而且，如果我们在组成联盟之后，在将兵力积极投入印度支那之前，就得到法国原则上的同意，我们以后在我们的（空中）力量参战时就能够使用这些武器。

两天后，杜勒斯表示，他和雷福德无疑会有机会“在某些时候”讨论这一问题。^①按照 20 世纪 60 年代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的分析，1954 年 4 月下旬，杜勒斯很可能已在巴黎向法国外长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 13, *Indochin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1270 - 1272.

乔治·比多暗示，美国也许能为法国准备好原子弹。^①

但是，艾森豪威尔本人作为总统始终没有批准在印支战场采取任何直接军事行动，更没有批准在印支战场使用核武器。1954年4月底时，在听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卡特勒的汇报时，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表示，在奠边府周围的丛林中使用“新型武器”（对核炸弹的文雅称呼）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使用烈性炸药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的袭击将更加有效；美国早先就中国公开干预印支战争作出的声明，是一种重要的威慑，而不是说明我们是否将在越南使用“新型武器”。^②几年后，艾森豪威尔还回忆说，他当时曾训斥卡特勒：“你们这些家伙一定疯了。我们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再次对亚洲人使用这些可怕的东西。我的上帝。”^③

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生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它们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1954年8月起，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和实施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行动。台湾当局不仅坚持顽固立场，并在12月2日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因而酿成了第一次台海危机。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不过，杜勒斯本人否定了这种说法。

^②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 13, Indochina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p. 1447-1448.

^③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71页。

这时，美国国内又有一些人考虑和建议使用核武器。1955年3月初，刚从远东访问归来的杜勒斯提出，在金门和马祖遭到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只有核武器才能提供有效的回击。^①3月8日，杜勒斯公开对中国发出威胁：不要把美国仅仅看作“纸老虎”；如有必要，美国将敢于“使用我们具有的更强大的力量来对付敌对力量”。他还炫耀说，美国拥有“精确新式的强有力武器，这些武器能够彻底摧毁军事目标而不危及无关的民用中心”。^②这里所指的显然是命中精度较高和爆炸当量较小的战术核武器。美国政府中不少人相信，战术核武器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3月25日，海军参谋长卡尔奈向记者透露说，中国将于4月中旬进攻金门、马祖，在台湾的美国军事顾问们正在敦促总统采取“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包括使用原子武器，以摧毁中国的军事潜力，消除中国的“扩张趋向”。国会中一些有影响的议员也推波助澜，鼓吹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战争。^③

在台海危机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显然持有更为谨慎的立场。1955年3月11日，他同一批高级助手讨论了这一问题，“在没有美国积极帮助或是美国不使用原子弹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具有何种“保卫福摩萨的能力”？参加者有杜勒斯、中央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③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成员等。最后，这位总统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根据会议的记录：

总统总结说，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地帮助国民党进行自卫；如果以后美国有必要干预，它应当使用常规武器；……美国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干预的时机可能到来，但是这必须是在最后，我们将必须首先通知我们的盟国。^①

确实，就在第二天的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美国在亚洲的全面战争中是否会使用核武器时，艾森豪威尔曾回答说，他无法“预测任何具体冲突的条件”；尽管如此，“在任何交战中，如能使这些东西严格地针对军事目标并且严格地为了军事目的，我认为在这样的交战中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像使用子弹和其他任何东西那样使用这些武器”。^②但是，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希望这一回答“在使中国共产党信服我们决心**的坚强**”方面“有所作用”。^③换言之，这一回答服务于一种威慑目的，而不是一种实战目的。

①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 - 1957, v.2,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pp.358 - 359.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80页。

③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1953 - 1956）》，第2册，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536页。

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58年8月下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开始了炮击，美国与台湾当局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叫嚣要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9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美国的军事干涉方案。它规定，在解放军对金门进行封锁的有限行动阶段，美国的主要反应限于在“国际水域”为国民党军队提供护航等间接支持；如果解放军对金门发起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将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美军在开始行动时不使用核武器，打击范围也不超过当地作战区域；在这些行动无效的情况下，美国有可能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并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如果解放军对澎湖和台湾发动攻击，美军将要求总统给予新的授权。^①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在一定条件下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必要性，但是将作出这一决定的权力紧紧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不过，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上，杜勒斯和军方的态度则积极得多。1958年9月2日，在与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进行电话交谈时，杜勒斯就谈到了这一问题。根据他的秘书的记录：

国务卿说，他不知道在使用核武器方面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有许多东西又从未能用上，那就是没有用处。国务卿问那种武器是否可用，特文宁说，可以。

^① 时殷弘、蔡佳禾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6-195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

特文宁说那里不是使用常规武器的地方。^①

杜勒斯显然又在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了。在他看来，任何武器如果未能被实际用上，那就失去了价值。1958年9月3日，杜勒斯还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同意，美军“应当使用小型核武器来打击共产党的机场和炮兵”，必须“有限地使用核武器来守住那些岛屿”，这是军方能够完成其任务的“惟一方法”。^②翌日，杜勒斯飞往罗得岛，与正在那里度假的艾森豪威尔讨论了在台海危机中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对总统施加了相当的压力。他说：“当我们决定将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内时，我们就意识到使用这些武器会有政治和心理上的危险”；“如果在赌注已经投下而我们因为世界舆论而不使用这些武器，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国防体系”。他甚至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要么同意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要么推翻当初总统自己提出的“新面貌”战略。杜勒斯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艾森豪威尔作出了让步。以他们两人名义写下的一份备忘录声称，虽然使用小型核武器将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感，但是美国如能迅速取胜，这种反感的影响要小于在中国的攻击面前作出让步的政治灾难所造成的损害。这一备忘录还宣称，他们愿意接受使用核武器所引起的风险，甚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82页。

^② 时殷弘、蔡佳禾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6—195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至愿意承受全面战争的风险。^①

但是，杜勒斯显然也作了重要让步。在由艾森豪威尔批准、以杜勒斯名义于同日发布的一项声明中，美国并未公开提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它只是说，“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福摩萨）日益相关……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②显然，总统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再一次抑制了国务卿的好战情绪。艾森豪威尔本人在1958年9月11日向全国发表的电视广播讲话中也没有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这种情况与第一次台海危机有着明显不同。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却是有意显示核武器的威慑价值。按照他的决定，可以发射核弹头的八英寸榴弹炮被运抵金门。并且，他明确要求这一部署应当能够被看到，^③以此来增加威慑效果。

这一时期美国在核政策上的矛盾也在欧洲显示出来。按照1952年北约理事会里斯本会议提出的目标，到1954年底时，北约在欧洲应当拥有96个师，包括32个作好了充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师。^④但是，在此后的两年中，既由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问题没有顺利解决，也由于西欧盟国缺

① 时殷弘、蔡佳禾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6-195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240页。

②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下）：缔造和平（1956-1961）》，第1册，静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355页。

③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④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48.

乏必要的财政和经济资源，这一目标远未得到实现。在此情况下，杜勒斯设想通过战术核武器来保卫西欧。他相信核武器不仅比常规武器便宜而且更为有效。^①军方也相信，在发展了低当量的小型战术核武器之后，以较少的军队就能履行北约的使命。早在1952年9月，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就声称，战术核武器可能最初无法减少为保卫西欧所需的部队的总量，但是它最终可使西欧的防务由少于预期中的部队加以完成。后来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雷德福海军上将更是认为，因为有了战术核武器，盟国的军队可以减少80万人，其使命仅限于民防和一些象征性的任务。^②

这样，1954年年中，欧洲盟军最高指挥部（SHAPE）向北约军事委员会的常设小组提交了一份三年计划，要求在可得到核武器的前提下重组北约的军事力量。它降低了对军队数量的要求，以核力量来替代部分常规力量。^③同年12月，北约理事会就此计划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军事委员会的第48号文件，授权北约军队的指挥官在可以得到和可能使用的核武器的基础上制定作战计划，从而减少实现1952年北约理事会里斯本会议提出的目标的紧迫性。^④1957年，北约又通过了一个五年计

^①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57.

^②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p.57-58.

^③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59.

^④ 陈佩尧：《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划，即军事委员会的第 70 号文件，建议在前沿部署 30 个师，它们将装备由美国控制的战术核武器。如果苏联或华约发起进攻，地面部队只起到绊索的作用，最终将导致击败敌人的将是核反应。^①

这种变化在北约理事会的公报中也得到了体现，尽管它们总是力图掩饰各种问题的严重性。1953 年 12 月的公报说，理事会“邀请军事委员会继续就最有效的军事力量的形式重新进行估价，在这一较长时期中……应对新型武器的研究效果给予应有的注意”。一年以后，理事会的公报又强调，要通过有效的联合演习以及“大量新的装备的提供”改善北约力量的效率和质量。1956 年 12 月的公报尽管没有正式放弃 50 年代初扩大军队规模的目标，却明确提出了因核武器的研究而导致的一项指示：未来的军事计划应当考虑到“北约防务可以获得的各种新型武器”。翌年 12 月的公报则比以往都更清楚和具体地提及了核武器。它说：“北约已经决定建立核弹头的储藏，这将使得它们可以在需要时被容易地用于北约防务”。^②

正是在此背景下，50 年代中期，战术核武器和可携带核弹头的机动部署的火箭和导弹，如“诚实的约翰”（射程为 10-20 英里）、“下士”（射程可达 75 英里）、“斗牛士”（一种无人驾驶的轰炸机，射程为 500 英里）等，从美国运到了欧

^①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59.

^②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59-60.

洲。^①以后，美国又在欧洲部署了中程导弹。基本设想是，来自苏联的任何进攻都将会导致北约的核反应，这种核反应可以立即作出，也可能在经过一个让苏联人重新考虑的短暂的“停顿”时期以后。在这样的核反应中，欧洲盟国也将发挥他们的作用。当然，核弹头依然始终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中。

但是，就像在远东一样，美国政府在西欧的低核门槛政策也遭到了怀疑和批评。一些人，如接替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李奇微将军等人认为，战术核武器可能比常规武器更费钱，需要更多的军队对之加以管理。^②另一些人（或者说，更多的人）则认为，由于西欧本身的脆弱性和核战争的恐怖性，在欧洲使用核武器（至少是战术核武器）以弥补常规力量不足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持有这样的看法。1954年7月，他在会见国外来访者时说：“原子战争将摧毁文明……如果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陷入一场战争，其恐怖的结果将难以设想。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战争。”一年半以后，他又在一份绝密的文件上批示说，在一场核交战中，即使俄国人遭受的毁灭是美国人的三倍，“大约65%的美国人需要某种医疗，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医疗……实际上，这是将我们从灰烬中挖出来再重新开始的事情”。即使俄国人尽力将他们的攻击局限于美国的空军基地，“在我们将遭

^① 科拉尔·贝尔：《国际事务概览（1954）》，云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55页。

^② Lawrence S. Kaplan,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58.

受的损失方面”，“也不会有重要的差别”。^①到了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总统任期的后期，这样的怀疑和批评更是变得表面化。1957年，当时尚未进入政界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就在他的一本书中说，不可能将“最大的恐怖与最大的确定”结合在一起。“一种武器的力量越大，反对使用它的阻力（除了在最极端的紧急状态下）也就越大，也就更可能没有一种目标似乎重要得足以证明对一场全面战争的依靠”；“如果政府愿意考虑这样一种选择，它就是在破坏自己一直坚持的立场：在战略事务方面，治疗不应比疾病本身更糟糕”。^②

四、核威慑思想最终确立

1957年8月下旬，塔斯社发表声明宣布，苏联顺利地进行了超远程洲际弹道火箭的试验。^③10月初，苏联用这种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1。它使美国人长期拥有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受到了强烈震撼，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有关国家安全政策（包括核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大辩论。如前所说，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具有的基本特点是低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73-174.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66.

③ A.A. 阿赫塔姆江等编：《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9页。

核门槛，即强调核武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的实战价值，试图以核力量来弥补常规力量的不足，必要时首先对苏联或其他对手实施核打击，以阻止它们的常规攻击。这种低核门槛政策又是建立在一种优越感和自信心之上的：由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占有的优势，由于苏联缺乏打击美国本土的核能力，美国可以有效地控制因此发生的核战争的范围，特别是不用担心核战争会扩大到美国本土。然而，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使得这种能够控制核战争范围的信念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也使据此建立的低核门槛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不少人指出，在苏联拥有洲际导弹后，低核门槛政策变得更加危险了，因为苏联决不会接受在欧洲或欧洲的某个地方打一场有限核战争的做法。一旦核武器被使用，它就不会让美国本土置身于世外。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城市也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说，“脆弱性加速了对美国战略的重新考虑”。如果苏联人可以对美国发起核进攻，美国显然将不想对苏联的常规攻击作出核响应，除非真正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①在该研究小组看来，甚至在苏联的军队侵入了西欧的情况下，美国都未必敢用导弹和轰炸机对苏联的城市发动攻击，因为它知道，这样的攻击会导致苏联对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或其他城市实施强度稍低但是同样蹂躏性的报复。

由于这样一种认识，到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美国的核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受到了越

^① The Harvard Nuclear Study Group, *Liv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3.

来越多的重视，而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1958年初，在就“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展开一年一度的辩论时，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回忆说，他当时曾经提出：

在我看来，总的问题是重新调整我们的战略，使其适应我们在相互威慑时期的需要。在此时期内可以假设，除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外，美国和苏联都将日益避免故意发动核大战。在此双方都能摧毁另一方的核对等情况下，大规模核报复政策除了作为遏制总体核战争或作为对发起总体核战争的一方的一种报复手段外，就没有其他作用。这一事实已如此明显，以致必须考虑苏联或我们的盟国是否还相信我们除了为保全自己外，将会运用报复力量。

我极力主张我们必须永远注意盟国对大规模报复的态度。我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较小的国家中，都滋长着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变得不灵活了。由于我们越来越依赖核武器和核报复作为我们军事力量的支柱，我们在这些盟国面前显得已经达到了只能运用两种办法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实力政治的地步，即要么就是运用全面的核力量，要么就是回避面临的挑战。在相互遏制核战争的年代里，我国军事力量的这种不灵活性只能对我们的政略提供很少的支持。我们的盟国有理由怀疑，为了应付有限的军事威胁，我们将冒因无约束地进行核反击而引起的毁灭的危险。

除了一般地对片面依赖核武器的低核门槛政策提出了批评外，泰勒还专门讲到了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一方面，他肯定“能量很低的原子武器”“在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做好应付有限战争的准备方面”“具有伟大的前途”；另一方面，他又淡化了战术核武器的用途：“必须经常记住，在许多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打算使用原子武器。”^①

泰勒的立场显然不是孤立的。195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基本国家安全政策”通过的声明说，“美国的政策是主要而非仅仅依赖核武器”；在“欠发达地区”发生了“局部侵略”的情况下，美国将“以一种估计可以最好地避免敌对行动扩大成全面战争的方式和规模部署并不拥有核武器的军队”。^②到1959年时，这种观点在国务院以及继杜勒斯担任国务卿的赫脱那里也获得了同情。同年9月，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有限战争小组”受命就在冲突中不使用甚至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进行研究。翌年8月，艾森豪威尔烦恼地承认说：“部队越是依赖于核武器，遏制任何有限战争或阻止它扩大成为全面战争的希望也就越是黯淡。”^③

当然，坚持低核门槛政策的官员依然存在。当时的国防部

^① 马克斯韦尔·泰勒：《不定的号角》，王群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3年，第57-59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74.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74.

长尼尔·麦克艾罗伊、海军上将雷福德便是其中的一些代表。总统本人的态度有时也是动摇的。例如，1960年10月，当上述“有限战争小组”就在冲突中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提出研究报告之后，艾森豪威尔却又不大情愿地斥之为“不现实”。他的理由是，“不幸的是，我们是如此受制于核武器，以致惟一可行行动是从一开始就使用它们，而不在它们和常规武器之间作出任何区分。”^①

到1961年初肯尼迪入主白宫时，一系列因素使得他的政府对低核门槛政策表现了更多的怀疑，谋求增加在依赖于核战争之前可以具有的政策抉择，提出了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灵活反应战略。这些因素包括：对甚至仅仅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的战争可能招致的严重结果的估计，由于中苏冲突苏联部署于欧洲的常规力量的下降，苏联及其盟国发展常规力量的潜力，低核门槛政策可能导致的核扩散的加剧。^②3月，在就防务问题向国会提交第一个咨文中，肯尼迪正式阐明了灵活反应战略的目的，“慑止所有战争：全面的或有限的，核的或常规的，大规模的或小型的；使所有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任何进攻都将是徒劳的；为政治的外交解决提供支持；保证我们在结束军备竞赛的谈判中具有足够的力量”。在同一咨文中，肯尼迪还强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75.

^② 参看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4.

调要“维持有效的威慑力量”。^①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说：“我们必须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可以适当的军事反应对抗俄国人的任何水平的挑衅。”^②

这一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在美国面临各种性质和强度的挑战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具有作出不同的响应和选择的能力。它的核心则是，推迟使用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核力量的时间，从而提高了核门槛。1961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分析报告说：“我们对提高核门槛的问题赋予了最大的重视。超出了这一门槛，总统就可能必须或决定发起核武器的使用。”^③根据灵活反应战略，在遭到苏联的常规进攻时，美国将采取逐步升级的做法，即首先尽可能以常规力量进行反击；如果敌人坚持不肯住手，就可使用低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如果敌人仍然继续推进，再以战略核武器对其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有限的核打击；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美国就要充分利用它的战略核力量所具有的威力。总之，按照灵活反应的要求，核武器将被推迟使用，战略核武器更是最后的依靠。显然，到了这个时候，在美国的核政策中，核武器的主要价值已经明确地转到了威慑方面。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14.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17.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15.

为了保证这种高核门槛和强调核威慑的政策得到推行，肯尼迪政府对其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一方面，努力加强常规力量的建设。在1961年3月的第一个关于防务问题的咨文中，这位总统说，非核冲突“对自由世界的安全”提出了“最活跃和持续的威胁”，但是“这样的冲突并不能证明和必然导致全面的核攻击”；因此，美国“必须增加将我们的响应限制在非核武器的能力，通过表明我们的反应将可取得的成就来削弱对手发起任何有限侵略的动机”。^①为此，美国在鼓励盟国本身发展常规力量的同时，还着手加强自己的机动力量。当年7月政策计划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这样的力量将有两个用处：第一是消除将可使用的力量（指常规力量）与核力量混淆起来的趋势：“在核僵持的条件下执行依赖于核武器的政策是非理性的。只有当迫使这么做的威胁是来自于一个被逼到绝望境地的对手时，它才是令人信服的”。第二是可以提供适应于非核升级的可信手段：“对一个不依赖于核武器而在推动冲突方面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对手时，使用一般非核力量的威胁并不能激起尊重”^②。古巴导弹危机以后，肯尼迪也说：“对于我们真正的安全来说，在隔离区的一系列驱逐舰，或者部署于边界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师，可能比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5.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6.

超出一切理性需要地成倍增加那种令人畏惧的武器更为有用。”^①

另一方面，努力发展和扩大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和远程轰炸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对肯尼迪政府来说，降低核门槛并不意味着减少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1962年2月，麦克纳马拉在一次演说中讲到，“核和非核力量相互补充，就像它们一起补充了非军事的政策工具一样。”^②特别重要的是，美国力图通过武器多样化确保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在面对苏联的第一次核打击时具有的生存能力，以及发动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这一做法的理论依据是，苏联有可能发展出防御一种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能力，或者摧毁一种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能力，但是，它不可能发展出防御所有三种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能力，或者摧毁所有三种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能力。

到了1961年11月下旬，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自信地宣布：

事实上这个国家拥有这样一种致命的核报复打击力量，敌人使用核武器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是他们自我毁灭的行动……美国甚至在遭到苏联的一次突然打击之后剩下的毁灭性力量，和敌人能够威胁发起针对美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6.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8.

国的第一次打击的全部完整的力量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它还要大。总之，我们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它至少是和苏联第一次打击能力一样大。因此，苏联将不会挑起一次主要的核冲突，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①

吉尔帕特里克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是个政府声明，因为事先他分别与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讲话内容进行过讨论，并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鼓励。腊斯克在吉尔帕特里克讲话的第二天接受电视采访时也说：

当我们使用均等这个词时，它的含义是，在两个强大力量集团的对峙中，每一方都能够拥有给另一方造成巨大损失的能力。因此，在处理两大力量集团的关系时，所有认真负责的政府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不去采取任何不负责任的或轻率的行动，不要以为在不致遭受很大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攫取对方至关重要的利益。^②

到1964年中，美国可用的核武器的数量比肯尼迪政府刚刚接任时增加了150%，可投射的当量增加了200%；美国新

①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520页。

② 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521页。

建的“北极星”式核潜艇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计划多出了 10 艘（总数达到 29 艘），“民兵”式导弹多出了 400 枚（总数达到 800 枚）。^①

在提高核门槛、加强可在实战中使用的常规力量、发展战略核武库经受第一次打击能力以及报复能力的同时，肯尼迪政府还对确定打击目标的原则进行了调整，以进一步实现核武器的威慑价值。

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美国并没有明确提出确定核打击目标的原则。但是，正如它对广岛和长崎进行的核轰炸所表明的，以及在远东和欧洲进行核战争的计划所显示的，当时它为自己确定的打击目标（特别是战略打击目标）实际是敌人的居民和经济。这种做法既是为了加强杀伤效果，同时也是由于投掷核航弹的轰炸机和第一代弹道导弹难以准确地击中军事目标。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美国发现苏联境内军事目标的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是由于美国核武器的命中精度的提高，在反思和批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谋求提高核门槛的同时，还试图与对手就限制核战争的规模与对手达成一种谅解或默契。为此，它着手考虑调整确定打击目标的原则。1960 年，美国防部首次拟定了“单一整合行动计划”（SIOP），提出了位于苏联境内的、可由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实施的 2021 个最佳军事和工业目标。1961 年和 1962 年，美国政府又对这一计划进行了修改，以便能够针对这些目标实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18.

施更为有限的军事打击。1962年，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正式阐述了“不打击城市”原则。他说，在苏联对西欧进行大规模攻击时，美国核反应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敌人军事力量的摧毁，而不是其平民的摧毁”。^①当然，美国指望，对于它的这一调整，苏联也能作出相应的回报，从而双方形成一种竞争规则，即在一场核战争中双方都能够将核打击局限于军事目标。

但是，美国的这种努力和意图当时就在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方面遇到了多重的阻力。其中主要包括：第一，苏联否认核战争有得到控制的可能，美国希望打一场有限核战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第二，正像美国一位防务问题专家唐纳德·斯诺所说的，美国实际的核能力也阻碍了这一原则的执行。^②对军事目标的打击需要命中精度非常准确的运载体系，当时美国拥有的大量导弹并不符合这一要求；此外，所部署的具有巨大毁灭能力的弹头，也使得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的企图成为幻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种打击军事目标的原则与追求核武器威慑价值的政策实际上是冲突的。由于打击军事力量的做法只有在敌人使用核武器之前最为有效和最富价值，对它的突出就意味着准备首先使用核武器，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敌人的核力量，赢得一场核战争。而核威慑的政策若要生效，双方对于它们的核力量的生存能力都应当怀有足够的信心，即它们应当能够经受一次突然的核打击，并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报复。

^① The Harvard Nuclear Study Group: *Liv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4.

^② 朱明权：《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0页。

面对着这样一对矛盾，肯尼迪政府的结论是，慑止一场核战争要比一旦这种战争发生而去限制战争的损失更为重要。到了1964年时，“确保毁灭”的确定打击目标原则和“相互确保毁灭”（MAD）的特殊威慑逻辑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地见诸于麦克纳马拉等人的谈论中。按照美国两位核政策专家阿兰·恩索文和K. 韦恩·史密斯的说法，“确保毁灭”的定义是：

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明确的、令人不会弄错的能力，足以给任何单独的或联合起来的作恶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即使在美国遭受到突然袭击性质的第一次核打击之后也有能力这样做，以此慑止敌人对美国及其盟国蓄意发动核攻击。^①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美国能利用报复性的核打击摧毁苏联人口的1/4-1/3，苏联工业的50%-75%。^② 麦克纳马拉等相信，如果美国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核威慑就能生效。

“相互确保毁灭”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通过使其处于易受毁灭的地位而得到保护，条件是与其对立的国家的居民也处于类似的易受毁灭的地位。^③ 按照这一原则，

①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87页。

② The Harvard Nuclear Study Group: *Liv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8.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20.

在一场核战争中，即使交战一方首先发起了核打击，而使另一方的核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者仍可利用残存的核力量对前者的城市和人口实施有效核打击，保证对方的毁灭。这主要是意味着美国接受苏联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接受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接受美苏之间的相互核威慑关系。麦克纳马拉有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假如美苏双方都具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将有利于保持它们间的“稳定的恐怖平衡”。^①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到 60 年代中，美国对核武器用途的认识完成了一个转变：从把核武器作为一种常规武器到将核武器当作一种特殊武器；从强调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到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价值；从认为如果发展了核武器而不使用就是一种浪费，到逐步认识到拥有核武器而无须使用乃是它的价值的最大体现。

出现这种转变并非偶然。一方面，应当看到，一些重要的具体原因促成了这一变化，其中包括：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主要对手苏联的核力量的发展；美国的盟国，尤其是西欧盟国对使用核武器政策的疑虑和反对；西方国家和平主义运动和反核运动的发展；核武器的不断扩散乃至第四和第五个核国家的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对核战争破坏性认识有所加

^① 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291 页。

深。这一切都限制了美国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自由”，促使它主要利用这种武器的威慑价值。

另一方面，就像其他的政策一样，美国的核政策也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先进的发展过程。它并非从一开始就有了一套完整的核政策；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它的核政策也远未达到“完善”和“成熟”的状态，还在不断发展之中。特别是由于核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未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其发展就受到了更多的制约和限制。总的来说，美国核政策的发展要落后于它的核力量的发展，要落后于它所处的安全环境的变化。换言之，同它的核力量的发展相比较，美国核政策的发展总是处于一种滞后状态。

当然，并非美国政府中的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转变。有些人还是处心积虑地要发展和利用核武器的实战价值。就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相互确保毁灭”原则的同时，美国还在悄悄发展甚至部署打击军事目标的能力。这样，公开宣称的原则与实际（试图）推行的原则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人对麦克纳马拉的“相互确保毁灭”概念进行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试图能够进行一场核战争并赢得一场核战争。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又积极推行发展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并正式退出了维持美俄间“相互确保毁灭”关系的《反导条约》，以加强美国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能力。但是，毫无疑问，任何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意图和努力，都不符合核武器本身的特殊属性，违背了核时代的和平与稳定的要求。这些人如若一意孤行，不仅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灾难，而且他们自己也将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成帅华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朱明权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任 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庄建中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孙 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张纪康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蕴思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